

党史资料

丛刊



第四辑

党史资料丛刊

一九八二年第四辑

(总第十三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颀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0,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书号 3074·660 定价 (六) 0.53 元

内部发行

党史资料丛刊

目 录

一九八二年
第四辑
(总第十三辑)

回 忆 录

上海地区党组织活动情况

关于早期上海地方党的一些情况许德良(3)

江浙区委派我回常熟组建党组织的情况

.....李 强(7)

上海印刷系统革命斗争

回忆上海印刷系统的革命活动钱 杰(10)

抗日武装斗争

“江抗”东进叶 飞(15)

新四军六团东进纪实黄 烽(25)

东路大事纪略张 麐(35)

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李 广(39)

记苏中反“清乡”斗争中的“汤团行动”沈仲彝(48)

资 料

东路一年林 俊(58)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大学学生马凌山(63)

目 录

专题研究

陈独秀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任建树(70)

国民党中统诱降瞿秋白同志始末记

..... 许映湖 王仰清(88)

关于通道会议的几个问题 宁教奎 张检明(102)

闽西工农通讯社 胡大新(112)

朱镜我传略 冯 明 朱时雨(119)

罗石冰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 尤 亮 张先根(129)

关于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代表的探讨 孙 岩(134)

革命报刊介绍

《青年工人》月刊 余福媛(141)

史迹简介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 夏顺奎(146)

来信摘登

侯绍裘烈士的爱人是胡鸣鹤 范志超 侯砚圃(148)

总目录(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 (149)

封面装帧 范一辛

党史资料丛刊

目 录

一九八二年
第四辑
(总第十三辑)

回 忆 录

上海地区党组织活动情况

关于早期上海地方党的一些情况许德良(3)

江浙区委派我回常熟组建党组织的情况

.....李 强(7)

上海印刷系统革命斗争

回忆上海印刷系统的革命活动钱 杰(10)

抗日武装斗争

“江抗”东进叶 飞(15)

新四军六团东进纪实黄 烽(25)

东路大事纪略张 麐(35)

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李 广(39)

记苏中反“清乡”斗争中的“汤团行动”沈仲彝(48)

资 料

东路一年林 俊(58)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大学学生马凌山(63)

目 录

专题研究

陈独秀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任建树(70)

国民党中统诱降瞿秋白同志始末记

..... 许映湖 王仰清(88)

关于通道会议的几个问题 宁教奎 张检明(102)

闽西工农通讯社 胡大新(112)

朱镜我传略 冯 明 朱时雨(119)

罗石冰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 尤 亮 张先根(129)

关于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代表的探讨 孙 岩(134)

革命报刊介绍

《青年工人》月刊 余福媛(141)

史迹简介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 夏顺奎(146)

来信摘登

侯绍裘烈士的爱人是胡鸣鹤 范志超 侯砚圃(148)

总目录(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 (149)

封面装帧 范一辛

关于早期上海地方党的一些情况

许 德 良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使我的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从而一心向往社会主义。一九二〇年我从中学毕业，经人介绍，进入英人办的伊文思图书公司当小职员。我到上海后，就到处找社会主义团体，但都无着落。一九二二年正当台风季节（大约七、八月之交），有一天偶尔在马路上遇到了小学时的同学周启邦。他原在四川路邮政总局当邮差，因邮局罢工失败，被洋人开除出局；领导这次罢工的李启汉也因此被捕入狱。周启邦知道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所在地，我们就约期同往。当时，悬在门口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牌子已取下。周和我上二楼，遇见张春木（即张太雷）和沈泽民，便将来意说明，他们即一致同意吸收我们参加青年团。

自此以后，我经常去平民女学。伊文思图书公司每星期营业五天半，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歇业，所以我每星期去一至两次。平民女学的校址在英租界成都路辅德里六三二号（现在是成都北路七弄辅德里四十二号），是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面积不大。我们都从后门进出。一进后门，走过灶间，便是楼梯。楼下的情况，知道得不太清楚，只知道这所学校实行的是半工半读，学生自食其力，一面学习，一面做裁缝或织袜，以维持生活。这些学生思想进步，有的是羡慕这所学校的进步性而就读该校的；有的是因为婚姻

不能自主，就此脱离家庭而进该校念书的。李达和他的爱人王会晤住在学校斜对面。平民女学楼上有三间房子，没有亭子间。客堂楼是教室，党和团开会都用这只教室（开会时间一般都在星期天下午）。当时，党、团员人数不多，全体到会还不满这一教室。教室东边的统厢房隔成前后两间，前厢房可能是学生宿舍，后厢房住着沈泽民、俞秀松以及另外一位同志——他不久就离开那里，所以不知其姓名。辅德里的这幢房子，可以说既是学校，又是党设立的机关，几乎所有在上海的同志，每星期都到那里去开会或者交谈。当时，党组织没有象后来这样严密，不相识的同志遇见时，往往由相识的同志向彼此作介绍。在平民女学经常遇见的有施存统（即施复亮）、王一知、沈雁冰和他的爱人孔德沚、杨贤江、徐梅坤、张春木、刘清扬、袁大时、徐白民、张秋人、张涤中、郭景仁和他的爱人（姓名忘了）、欧阳笛渔和他的同学（姓名已忘记，两人都是中华职业学校学生）、张廷灏（复旦大学学生）、雷晋生（震旦大学学生）、彭习梅、张人亚等人。因为邵力子和陈望道是平民女学教员，也常遇见。除上面提到过的人之外，当时在上海的党员，遗漏的大概不会太多了。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杨贤江入党的时间问题。我从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是在平民女学。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党在客堂楼教室开会结束，杨贤江走出会场时，即代表党通知我说：“许德良同志，今天党开会已一致通过，从今天起你是中共正式党员了。”如果那个时候——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杨贤江还不是中共党员，他怎么有可能代表党通知我从那时起转为正式党员呢？所以，杨贤江的入党时间，决不会迟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当时，可能因为党员人数不多，党员没有分小组过组织生活。我转为正式党员后，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底平民女学结束，都是与大家一起开会，参加些支援罢工和逢节日到马路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活动。

从一九二三年初起，党的机关即转移到闸北宝山路和宝通路一带。在记忆中，我第一次遇见王荷波和蔡和森是在宝山路宝山里总弄东首一条弄中间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楼上。李成（即李立三）住在那里。有一天早上，我去那里，一位女同志（姓名已忘记）睡在楼下客堂里用两张桌子并在一起的桌面上，尚未起身。无疑这是党的一个机关。在宝山里底总弄弄口西边第一幢房子（前门是宝源路）的楼下，住着邓中夏。我住在联盛里第一弄第一家，后门的斜对面就是邓中夏住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去那里。去时经常遇见陈独秀、恽代英、肖楚女、董亦湘等。他们主要是一起研究工作。记得《中国青年》的出版，就是在邓中夏那里作出决定的。《中国青年》封面的题词也是邓中夏的手笔。一九二四年寒假后，上海大学迁至租界西摩路（现在是陕西北路），邓中夏也于同时迁至租界马霍路（现在是黄陂路）。党的另一处机关是在宝通路南端虬江路铁路桥旁边弄内，是一幢座南朝北的石库门房子，后门进出。每期《向导》出版后，我即去领取带往复旦大学（一九二三年春季开学，我考进复旦大学）分发给那里的党员。每次去领《向导》时，只遇见张国焘一人。当时，团的负责人（是中央的还是上海地方的不清楚）卜士奇也住在临近。党的机关迁至闸北后，党员人数较前增多了。党员大会是借小学校召开的。有一次，借浙江路华兴里竞励小学的教室作会场，出席的人数，坐满了这一教室，大约五十多人，主持会议的是邓中夏。毛泽东、方志敏、赵醒侬、夏曦等都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中举行选举，邓中夏还提议选刘仁静，在介绍他的情况时说，他短小精悍。这是一次什么性质的会议，现在回忆不起来。会议时间，大约在四、五月之间。

上海地方委员会何时开始成立，我完全不知道。记得在一九二二年底或是在一九二三年初，在学校寒假期中，曾在上海大学开过一次会，会上陈独秀推举我担任地方委员。后来，我进复旦大学

学习，从未出席过地方委员会的会议，更没有担任过委员的工作。到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我知道党内设有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国民运动委员会，主要是做国民党的工作，委员长是沈雁冰，后来（确实时间回忆不起来）国民党左右派分裂，左派从原来设在环龙路（现在是南昌路）四十四号的市党部迁至陶尔斐司路（现在是南昌路复兴公园东面的一段）另立党部，沈雁冰也在那里办公。另一个是劳动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是王荷波，劳动运动委员会分配给周启邦负责邮局工人方面的工作。我入党以后，一直同周启邦在一起做这方面工作。那时，周在吴淞中国公学学习，后来进了黄埔军官学校，他不在上海的时候，由我负责这一工作。

大约从一九二三年七月份起，党内开始按照居住相近的原则，将党员编成小组。也有少数党员因居住相近的地方没有其他党员或者因居住地点不明而未编入小组的。当时究竟编有多少小组，我不清楚，只记得上海大学、商务印书馆和西门各有一个小组。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小组的数目亦逐渐增加。于是，在同一个单位或地段就成立了支部，下辖几个小组。只有很短时间，我被编入商务印书馆小组。在此以前和从一九二四年我进上海大学工作起，一直参加上海大学的党小组，组织生活也逐渐正常化。和我编在一个小组内的，前后有严信民、瞿秋白、张春木、彭习梅、施存统、邵力子、邓中夏、李春蕃（即柯柏年）、高尔柏、沈志远（原名沈观澜）、张崇德、蒋光赤、侯绍裘、韩觉民等。

（原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二期）

江浙区委派我回常熟 组建党组织的情况

李 强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那时候，我正在上海南洋路矿学堂读书，加入了国民党。在南洋路矿学堂成立了上海市第四区党部第十七区分部，我任常务委员。当时，第四区党部来了两位负责人，一位叫朱义权，另一位叫石克士。朱义权是左派，石克士是右派。我加入了国民党后，积极参加了左派活动。五卅运动时，作为南洋路矿学堂的代表，我天天去上海学生联合会开会。不久，就由上海大学代表郭伯和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加入青年团以后，即被派往曹家渡区工会第五办事处搞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人运动。带我一起工作的是瞿景白，还有顾修也是做青工运动的。工会第五办事处是江元青负责。党的工作负责人是陈祝三。八月间，组织成立党的曹家渡部委，书记是陈祝三。我任青年团的部委书记，也同时转成党员。团的部委组织委员是毛齐华，宣传委员是胡鋈鹤，他们两人都是青年工人。毛齐华现在是浙江省政协主席，胡鋈鹤后来叛变了。一九二六年初，过了农历年，我被改派往团浦东部委任书记，宣传委员是李伯钊。到了夏天，我又改任为团吴淞部委书记。到任没有多久，组织上又调我去制造炸药、炸弹等军火物品，为秋冬间组织暴动作准备，归罗亦农

回忆录

领导。这时，我就不搞青年团工作了。我在一九二五年底就认识了罗亦农。

党的江浙区委成立，罗亦农任区委书记。后来他找我谈话，要我回到常熟去发展组织。当时他还派了一些人到外地去搞建党工作。我记得陈云是被派到青浦去的，陈养山是被派到绍兴去的；还派了哪些人出去，现在记不得了。

我接受任务后，就回到常熟，住了一个时候，找到了原来已是党员的周文在，又发展了王耕英、曾雍孙两人，建立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当时江苏省委还没有成立，共产党员侯绍裘、尹介眉虽然到过常熟，但没有建立过党组织；我也曾到苏州去找过许金元，谈起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后来也没有下文。中共常熟特支，是在罗亦农派我回常熟后建立的，这个特支归江浙区委罗亦农直接领导。

特支建立起来后，又发展了邹逸中。我们经常上党课，学习党的纲领、性质、任务，还有党的组织纪律等等。不久，我就回上海去了，周文在也回了上海。根据罗亦农的指示，我把常熟特支的工作交给王耕英负责。临行时，我还把一些宣传品交给了王耕英。

暑假期间，我带了几枚手榴弹又回到常熟，同曾雍孙去北门外桃源洞练习实弹爆炸。这次返常，检查了特支的工作。他们曾出版过一期《警报》，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活动欺骗、麻痹人民，侵略瓜分中国，因而遭到了一些信教学生和地主势力的非议和指责。王耕英顶不住，把交给他的宣传品统统丢到尚湖里去了。我批评了他，他就声明退出组织。于是，仍由我接管了特支工作。但是，我们和王耕英的友谊还是很好的；他虽然已经没有组织关系了，对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支持的。

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至一九二七年四月止，这段时间，我主要在常熟活动。其时江苏省委仍未成立（最近我听说，中共江苏省委是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的五六月间成立的），特支仍

属江浙区委罗亦农领导。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胜利后，我曾去过一次上海，找到了罗亦农，汇报了常熟特支的工作。他告诉我，党的方针是扩大力量，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他还指示我要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并给了我不少宣传品，让我带回常熟。

我回常后，常熟特支的工作，主要是推动筹建国民党县党部，迎接国民革命军（即北伐军），同时，发展了党员，扩大了党组织。

国民革命军一到常熟，我们的活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邹逸中是国民党常熟县党部的常务委员，我们的工作大都是通过他出面去做的。钱宗灏、顾近仁等负责工人运动，钱宗灏还负责学生运动。我们张贴了不少“为周水平烈士复仇”的标语，发动反封建斗争。在农村里，建立了三个国民党的区分部，成立了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也搞得很火热。国民党常熟县党部公开后，曾推举我为常熟县县长，但遭到了驻军六十三团团长陈诚的反对，经过几次洽商争论，决定成立“常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地方开明士绅钱南山为主席，我为委员。钱南山是钱宗灏的父亲，对我们的工作，是同情和支持的。陈诚那个团里有两个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曾来找过我，后来我介绍他到贺龙的军队里去，曾和我们一起参加过南昌暴动。我在常熟，还曾介绍过不少人加入共产党，但是，他们的姓名，都记不起来了。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我奉命于四月十四日离常去武汉。因为邹逸中的面目并不太红，与新军阀的关系比较热络，所以，我便把党的工作交给了邹逸中。

我去武汉前，曾雍孙到上海，找我谈了常熟的情况，我要他回去负责将党的组织活动转入地下。从此，我和常熟党就没有直接发生过关系了。

（中共常熟县委征集革命文史办公室供稿。）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李强同志审定）

回忆上海印刷系统的革命活动

钱 杰

我在一九三八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三九年入党。当时在印刷工人中成立了一个公开的群众组织“上海印刷业业余联谊社”（简称“印联”），我担任干事。同时还有一个秘密组织“印刷工人救亡协会”，我也是骨干之一。一般活动都由“印联”出面，我们通过“印联”宣传抗日，组织和发动广大印刷工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印联”引起了汪伪特务组织的注意，不宜再公开活动，党组织决定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三日宣布解散“印联”。这样，上海印刷工人中公开的群众组织就不再存在了。随即，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半公开的群众组织“三三求知社”（以“印联”宣布解散之日命名），继续在印刷工人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租界，“三三求知社”又被迫停止了活动。当时，党在印刷业中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领导，但分别建立了一些党支部，如铅印业、商务印书馆、华纳印钞厂等都有党的支部。先后负责铅印业党支部的有吴承庸、赵鼎、顾松；华纳印钞厂支部负责人是傅一尘，傅去解放区后张腊良接任；商务印书馆支部负责人是徐文蔚、姜士雄。一九四二年一月，成立了中共上海印刷区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新闻、出版、印刷三个行业的革命斗争。区委领导共三人，姜士雄任书记、储竹书任宣传、我任组织。我们的上级联系

人是钦家俊。五六月间，由于吴承庸叛变，钦家俊、姜士雄、储竹书等十多个同志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钦家俊、姜士雄、朱惠清、严同宇、孙桂和等先后在狱中牺牲。解放后钦家俊被迫认为烈士。我当时正好到新四军去，未被捕。区委被破坏以后，我们决定把一部分党员转移到解放区，一部分留下来继续工作，我也留了下来。

当时为了以公开职业作掩护，根据上级指示，我和陈伯阳、周振明合伙办了个建业印书馆，陈、周二人出资，我任经理。他们两人不是党员，但也替党组织做过一些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周当上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印刷厂的总经理，我通过他搞了一些市政府印刷厂的工作证，给一些没有公开身份的党员用。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印刷公司，也是我们地下党开办的。上海印刷系统与新四军关系很密切，经常为新四军印文件等，如我爱人顾炜（党员）父亲开的永昌印刷所就是我们活动的一个据点，它为地下党、新四军印过不少文件、宣传品，还有新四军收税用的税票等等。新四军军部的印刷厂基本上都是上海印刷工人帮助建立的，并为他们输送技术力量。印刷工人被派去当地下交通的也不少，如张达平、陶厚卿、郭廷琛（后改名陈广汉）等。

一九四四年，发生了新的问题。我们有个党员叫黄乃畊，一九四二年区委被破坏时敌人的名单上有他，因他在新四军而未被捕。这时他又回到上海，安排在中国印刷公司当排字工。但他被日本特务发现了，把他找到法租界嵩山路警察局进行威胁利诱，想收买他。他回来后立即向我汇报，我们就连夜把他送到解放区去，同时又做了一些紧急安排，把一些可能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也送走，如建业印书馆的地下党员郑志敏去农村暂避，积极分子顾建群（原名顾麟瑞）去新四军等。同年九月，日寇根据一九四二年印刷区委被破坏一案的线索，逮捕了我，同时被捕的还有我爱人顾炜和建业印书馆的学徒郭苗钦以及老板陈伯阳和周振明。这些人中只有我

和顾炜是党员，但敌人不知道建业的内部情况，所以没有怎么审问他们，集中力量对付我。敌人反复追问我党的活动情况，我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什么都说不知道。敌人见问不出名堂，就用酷刑折磨我，逼我开口。我几次昏死过去，但拒不承认。因敌人没有抓住证据，关到十一月底，只好把我释放了。

当时，根据党组织的意见，我有意识地与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曾政忠接近。此人是重庆派到上海搞军事情报的。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因曾政忠被日寇逮捕受到牵连，再次被捕。曾全部招供，投降了，不久即被派往重庆与国民党拉关系。因他对日寇说我不是他们的人，于是日寇就说我是共产党，又用酷刑，逼我承认，我仍是矢口否认。直到抗战胜利我才出狱。

抗战胜利后，印刷业的革命斗争又进入了高潮。“印联”恢复了，在法租界宁波路的四明公所召开了千把人的成立大会，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沙千里等也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印联”新任理事长是毛人为，理事有顾炜、杨嘉麟、彭克美、郑志敏等。我担任总务理事兼党组书记，同时还担任党创办的《联合日报》、《联合晚报》工务部主任。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爆发，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印联”又转入地下，暂停公开活动，党员则分别打入各类工会，如报业工会、派报工会、彩印业工会、印刷业职业工会、印铁业工会等等。这些工会名义上是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实际上都是由我党控制的，领导核心都是党员，这些工会都建立了党支部。还有中央印刷厂、上海市政府印刷厂、商务印书馆、富通印刷所等也均建立了党支部。这些支部和工会由我和顾炜共同负责领导。地下党上海市委中分管印刷业的是毛齐华。我们在延安中路浦东大楼六楼租了一间写字间作为秘密机关，晚上我们在那儿收听短波，把新华社广播记录下来，再印发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

我在抗战期间认识的那个军统特务曾政忠这时又作为抗战有

功人员回到上海，我仍以商人身份与他打交道。因我过去曾受他的牵连而被捕，所以他对我另眼相待，经常和我接触，他家里请客，把我作为上宾。他还把军统头子刘芳雄介绍给我，我暗中了解到一批军统特务名单向党组织汇报。我还经常利用他的汽车送文件，避免敌人的检查。他手下的一些特务也认识我，有的特务还要我替他们向曾政忠求情。因而这个关系就给我的工作带来不少方便。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组织上告诉我，中统特务机关有我的黑名单，要我立刻离开《联合日报》，并要我利用军统特务与中统特务的矛盾，做些生意，又可作掩护。当时曾政忠除在军统任职外，还是天隆染织厂的总经理，他与天章造纸厂老板刘卓勤很有交情。因天章造纸厂在敌伪时期与日本人合作，抗战胜利后被控为敌产，由于曾的庇护而未被接收。我就要曾给我介绍参加包销天章生产的纸张生意。当时全市已有六家批发商包销天章的纸，我加入后就成为七家包销。我用钱寅源这个名字在慈淑大楼上开了盈记纸行，登记时用曾的名义，赚了钱则归我，大部分用作党的活动经费。

有一次，我地下党一个领导人被国民党浦东地区的一个司令官张先林逮捕，组织上要我利用曾的关系去营救。我打听到曾手下有个特务叫钟信宝，与张先林是要好的同学。我就请曾和钟两人吃饭，对他们说我有个亲戚被抓起来了，请他们帮帮忙。曾就要钟去和张说一下，结果钟一个电话就把人放了出来。事后，我又请钟吃了一顿饭，并送了他一笔大约值几百块银元的厚礼。这次营救是比较冒险的，幸好未暴露。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间，国民党大抽壮丁，为了保护我们的同志并取得公开合法的身份，我又利用曾的关系搞了一些证明。当时曾是军统领导的山东交通警察总队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我对他说现在抽壮丁，我厂里的人也怕当兵，请他搞几张证明。他就给我